



學生書局四十一年專題報導－ 訪學生書局總經理鮑邦瑞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研究生
萬麗慧

如果不特別提起，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對國內學術出版貢獻頗多的學生書局與國民政府其實有著極深的淵源。在國民政府遷臺後，一群當時曾追隨孫立人將軍在軍中精忠報服役的軍人，因為熟悉編務、對文化有興趣，於是投資了一點錢，希望成立個出版社，以便在業餘或退役後有個可以貢獻所學的地方，因此在劉國瑞、馬全忠、沈克勤的發起下，又有馮愛群、丁文治、楊邦畿、羅奉來、王啟宗、盧惠如、盧成信等加入，共十幾個股東，大部分都是同鄉或是熟識的人。

從兒童讀物起步

顧名思義其實「學生書局」在最創業之初就有計劃要出版兒童讀物，所謂「學生」指的正是國小學生，而所以明明要創辦一個出版社，卻以「書局」為名，則是因為當時的國語日報已經有個「學生出版社」，在登記時需要避免混淆，且在創業之初，由於資金募集困難，創業時股本只有五萬元，且其中還有一萬元是在之後的一年內才陸陸續續湊齊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書局」初期確實只有賣書，而沒有直接加入出版的行列，因此名為「書局」其實也是名正言順。

談到「學生書局」創立時的艱辛，馮愛群先生在《學生書局二十年》的文章曾提及，開幕時也是股東之一的羅奉來，特地到他家搬書到書店充場面的趣事，而劉國瑞先生更是向「聯合書店」的唐賢龍先生借來很多書，才能把店面襯得稍微像樣，可見當時的景況確實不佳。但無論如何，憑著大家對文化事業的熱情，「學生書局」依舊於民國 49 年 3

月 6 日，在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50 號，一個簡陋的違章建築中創業了，之後「書局」雖曾遷移到羅斯福路三段，後仍又遷回和平東路，「書局」的現址是和平東路一段 198 號，與創業的基地相隔甚近，想來也是一種緣分。

「學生書局」就這樣開始了，但賣書沒多久，就發現如果要生存光靠賣書實在是不行的，非得趕緊出版自己的書不可。在幾個股東的商討後，認為兒童讀物確實是一個當時尚未被注意到的出版市場，加上首任董事長馬全忠的英文很好，教育部那時又正在提倡科學教育，於是「學生書局」就從英國引進了一部《兒童百科》，全套共 10 冊，售價 40 元，推出後深受各界好評，短期內就賣了五萬多部，另有《科學天地》也有不錯的銷路，就這樣「學生書局」為自己奠定了初步的經濟基礎，之後在民國 51、52 年，又由具有深厚國學底子，也是當時國防部一處處長的劉屋撰寫了《兒童修身故事》，內容主要是在提倡中國傳統文化，書內並有繪圖，也在市場上得到不錯的反應。

走上學術出版的道路

民國 53 年已從軍中除役在臺大任教的史學家吳相湘教授，憑著其對當時圖書市場的敏銳觀察，有了編輯《中國史學叢書》的計畫，一口氣就開出五十種書，共兩百零六冊的出版計畫，當時書局根本是無力承接，但值此之際，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突然一躍成為全世界舉足輕重的國家，但由於美國對亞洲的了解向來較為生疏，為了解亞洲地區，於是在民國 53 年間成立了「亞洲



學會」，由美國國防部撥款，開始大量收購與中國相關的文獻，那時「亞洲學會」一下就訂了100套，且先付50套現款，就是因為有了這筆經費，這套書才能繼續出下去，最後共出了精裝本206冊（後又有續編50種，189冊），其中包括特地向曾國藩後裔所取得的「曾文正公手寫日記」6冊、「曾惠敏公（曾紀澤）手寫日記」8冊等珍貴史料，加上所選的版本都有極高的評價，又對照像、製版、印刷、裝訂等要求極為嚴格，書籍製作品質精良，因此在市場上的反應也十分熱烈，也因為這樣的時局，當時的「文海」、「成文」出版社都紛紛加入翻印古書的行列，一時間國內的出版業旋即掀起了一股翻印古書的熱潮。「學生書局」就在吳相湘的引導下，走出了「學生」的階段，開始學術出版的道路，而書局原本兒童書的出版路線也至此宣告中斷。

回顧「學生書局」在學術出版的歷史，概略可分為兩個階段，最初是偏重於整理和影印古籍，除了奠定學術出版基礎的《中國史學叢書》，書局又在民國56年間，接受費海璣、周開慶教授等的建議出版《新修方志叢刊》（229種，精裝725冊），之後又有昌彼得教授主編《歷代畫家詩文集》（50種，精裝76冊）、屈萬里教授主編《明代史籍彙刊》（26種，精裝80冊）和《雜著秘笈叢刊》（16種，精裝36冊），劉兆祐主編《中國史學叢書》三編（4輯，50種，精裝138冊），由於這些書在當時大部分都是外銷海外，為書局賺進大量的外匯，馮愛群先生在「學生書局二十年」的文章中還特別記得，當時書局的兩句口號：「文化輸出，外匯輸入」。此外，書局還翻印民國一、二十年間的一些重要的學術刊物，如：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923.1~1937.6，6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928.5~1937.2，10冊）、圖書館學季刊（1926.1~1937.6，10冊）、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30.4~1942.10，12冊）、學衡（1922.1~1933.7，10冊）、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1931.3與1936.12，1冊）、中法

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1945.3~1946.10，1冊）、學文（1920.11~1932.5，1冊）、中國學報（1944.3~1945.4，2冊）等，除了這些學術性的刊物，書局也翻印著名的《申報》，共40冊，收在《中國史學叢書》初編，這些資料在圖書館和學術界都獲得良好的反應。

由上可知，在「學生書局」從事學術出版的第一階段，對於古籍的整理和出版確實有著不小的貢獻，關於這點國家圖書館編審張錦郎先生在「臺灣四十年來古籍整理的發展與成就」論文中，也曾特別提到幾個「學生書局」在整理出版中國古籍方面的特色：1.底本屬於善本、孤本或是稿本。如：1987年出版的《善本戲曲叢刊》，所選22種大部分是歐美各大學圖書館僅存孤本或善本，1989年出版的《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收歷代神仙資料近二十種，大部分也是僅存孤本於國內外圖書館或私人藏書家，1970年出版的《歷代畫家詩文集》，有些屬於稿本，一如《東洲草堂詩鈔》、《耿菴詩稿》。2.底本屬於罕見、傳本極少或「四庫」未收者，如1971年出版的《雜著秘笈叢刊》和1970年出版的《明代史籍彙刊》，就有收很多這類書籍。3.正文前有出版前言或序言，收錄各書均附有敘錄或提要，由各大學教授執筆，如《明代史籍彙刊》和《明代史籍彙刊》第二輯，有劉兆祐教授撰寫的敘錄24篇。《中國史學叢書》收錄各書則有蔣復璁、姚從吾、黃彰健、毛子水、包遵彭的序文，又如《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乙書收有二十餘篇，每篇均有方豪教授的提要。由此，更能明白，雖然當時翻印古籍的出版社不在少數，但「學生書局」確實能掌握住自己的出版特色與原則。

「學生書局」學術出版第二階段的開啟，是在越戰後，當時任中華日報副總編輯，也是學生書局總經理的馮愛群，於民國61年冬，因赴越南參加一項國際會議歸國時入境香港停留了幾天，覺得可以在香港當地找一些知名的學者，於是找到了他在大陸一起求學的老同學，也是當時在文章做法上學有所專的梁



宜生先生，梁先生立刻介紹唐君毅給馮先生，當時在國內的文化復興運動正在開展，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思想分歧、瑣碎，未形成一股主流，而從事新儒家運動的國際知名人士，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羅光教授等，關於中國思想方面的著作，卻因國內出版社始終站在生意人的立場，而無人敢出版，少數的幾本也多被擱置在書架的最上層，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但馮先生在和唐先生晤談過後，立刻就決定要出版唐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並決定即使因銷路不好，虧個八萬、十萬也要認真出版這部好書，也因此唐君毅決定把他日後的學術著作都交由「學生書局」出版，原因就是喜歡「學生書局」是站在推廣文化工作的立場在和他交談，而不是在和他談生意，也就在出版唐君毅先生的作品後，「學生書局」的名氣愈來愈大，之後牟宗三、徐復觀等哲學大師，及當時的輔大校長羅光等開始紛紛慕名而來，當時「學生書局」可說是一口氣就出版了，唐君毅的著作16種、牟宗三的8種、徐復觀的9種、錢穆的4種、羅光的11種，這也使得書局一躍成為出版中國文化與學術鉅著的重鎮，至此「學生書局」算是正式走上了學術出版的道路。至今，由「學生書局」所出版的，《唐君毅全集》（精裝30冊）；牟宗三的《中國哲學特質》《中國哲學十九講》，以及《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上、下冊）《康德：判斷力之批判》（上、下冊）；徐復觀的《中國藝術精神》《兩漢思想史》（共三卷）《羅光全書》（精裝42冊），都是這些大師頗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沒有熱情就不要做學術出版

在出版的企劃方面，由於學術的範圍廣大，每個領域又有很細的分項，要能通盤了解並不容易，因此在書籍的企劃多半不會由出版社主動提出企畫，而是由一些學者主動提出一些研究計畫或出版建議，大家再針對計劃做更具體的溝通，如果計畫可行，就會請教授執行，如

果計畫很龐大，就會請教授擔任主編帶領一個小組或是幾位教授一起執行計畫，「學生書局」倚靠的是在學術界長期建立的良好關係，儘量利用外援來做事，內部其實只有一名編輯，主要是負責行政和聯繫的工作，編制極為簡單。而如果是個別的來稿，書局內會有一個審查制度，目的是為平衡出版的水準，和預估市場的狀況，通常只要是夠水準的書，原則是只要不賠錢，書局就會出版。

但有時學術書的出版並不能只看單本的效應，現任學生書局總經理鮑邦瑞就特別提到在屈萬里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的時候，想要將停刊二十年的《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在臺復刊，但限於政府的預算和編制，無法如願，就求助於當時也仍基礎脆弱的學生書局，結果在民國56年6月間，透過與中央圖書館的合作，真的使《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在臺復刊了，這是學生書局對中國圖書館界首次無私的貢獻，雖然賠了不少錢，但也為學生書局和圖館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得以陸續出版許多銷售狀況不錯的圖書館學方面的書籍。

從事學術出版多年，主事者當然也明白學術界中其實也有所謂的流行風潮或知名教授，能在流行時搶到這些受歡迎的書或教授，對出版社的收益自然是大有幫助，對此鮑邦瑞表示，書局很少會去搶這些流行，原因是書局的財力實在不若三民、五南等財力雄厚的出版社，因此只能在穩定中求進步，書局傾向和一些比較努力治學的教授保持長期而良好的關係，不少教授在還未成名時就已經在書局出過不少書，成名後自然多半也會繼續在書局出書，也正由於不跟隨流行，學生書局反倒是常常扮演創造風潮的角色，如在圖書館學、新聞學、語言學等領域，當時的書局都是走在最前端的。一本由中國圖書館學會主編的《圖書館學》，結合了十二位當時全國圖書館界的精英集體創作，成為當時大學圖書館系普遍採用的教材；一套由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主編的《報學叢書》，是



國內最具權威性的新聞叢書；語言學方面的《現代語言學論叢》，更是成為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前衛」；其中又以民國55年9月16日創刊，到89年12月已出版了34卷第3期的《書目季刊》最為人稱道，但由於《書目季刊》所收內容皆為圖書文獻學或版本學等專業學術論文，雖頗受海內外學術界重視，發行量必竟有限，創刊至今每年總要虧損個十幾、二十萬元，但書局把這方面的開銷當做廣告費用，仍是想辦法持續經營下來，想來所謂「出版家」和「出版商」的分別正在於此，書局在求取自身成長的同時，也不計成本的為學術界貢獻了不少心力。

鮑邦瑞表示：「做學術書的出版需要一點熱情，如果沒有熱情就不要做學術書的出版。」曾經有一本《武進劉逢祿年譜》，這是一本由林慶彰教授的高足張廣慶的論文改寫的書，內容十分嚴謹深受林老師的推崇，但顯然的這是一本冷門的書，但學生書局決定要出這本書，而且比照一般作者的條件，並不要求作者做任何的補貼，當時作者已經罹患癌症，鮑邦瑞描述出版這本書的心情：「我要讓世界上的人知道曾經臺灣有過這麼一位治學嚴謹的作者，我要讓他在學術界留名，這是一個出版者的良心。」

就在學生書局滿四十年時，鮑邦瑞更主動提出了一個出版計畫，這個計畫結合了學界中生代的人，共分為文學、哲學與宗教、語言文字學、經學、圖書文獻學五冊，內容是整理從1950到2000年這50年間，臺灣在學術上的貢獻，目前已陸續出版，鮑邦瑞表示，這個出版計畫主要是想對學界做些回饋，他認為這樣遠比花大錢辦個社慶饗宴有意義得多，由此更能看出「學生書局」對學術界的用心支持。

行銷全球，服務第一

四十幾年來，「學生書局」已經累積了不少的出版品，對學術界有著不小的貢獻，但學術書籍多半的銷售都較為緩慢，加上銷售對象較為固定，多登廣告其實也起不了什麼

作用，有時反到會因廣告費的增加，使經營的財務狀況發生困難，因此「學生書局」除了在自己印行的《書目季刊》上刊登廣告，就很少在報章雜誌上刊登廣告，多半是透過固定的銷售地點進行書籍的販售。

在國內，「學生書局」會在每所大學周邊，找一家固定的合作書店，一有新書就會將樣書寄去，如果有人訂書，才會出貨，並無特別的推廣活動。而很難想像在國內一般消費者心中知名度不大的學生書局，在國外卻擁有廣大的國際市場，據估計平日國外市場的營業額約佔總營業額的七成以上，全年度平均下來也會佔到年度總營業額的一半，替國家賺進大量的外匯，這樣的比例確實讓人覺得有些意外，但其實早在馬全忠在聯合報擔任編譯主任，又在中央社國外部兼差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為「學生書局」奠定打開國際市場的基礎，馬全忠搜集了很多國外研究漢學的學校和機構的資料，並每天不斷的對這些單位或個人採取攻勢，寄送新出版的圖書目錄，就這樣慢慢建立起「學生書局」國外的行銷網，現在每一月或每兩個月，書局就會從電腦中選出一份學術性的書訊，持續寄發給國外與漢學研究相關的單位。過去書局的海外市場主要是在美國，而後轉移至香港，近來則以日本市場為主，其他如西德、法國、荷蘭、英國、加拿大、韓國等也都有銷售據點，共計約有三十餘處，如此看來「學生書局」反倒是國內在國際間知名度最大的書局。

除了在國內外特別的地點設置銷售據點，「學生書局」向來以自己的服務品質自豪，書局十分重視自己的服務品質，即使是一、兩本書，也會立即處理，如果真的一時沒有書，也會立即以傳真回覆，先讓讀者知道現在的狀況，在今年臺北國際書展期間，有一家日本出版社就曾親自向鮑邦瑞稱讚「學生書局」處理訂單的速度，這樣的效率，並不是來自「學生書局」有特別優異的電腦軟體可以輔助，而是來至於顧客至上的服務精神，王熙元教授在為學生服務的學生書局一文中，也特別提



及書局接到電話時客氣、迅速的服務態度，甚至有時需要其他的教科書，又一時間不方便，書局也會幫他代勞，而當時書局為學生做研究生論文手抄本照相、製版、印刷、裝訂的業務，也因效率高、價格便宜，而頗受各校師生歡迎，且通常在圖書的價格上，「學生書局」也往往會盡量給予學生特別的優惠，是一個真正為學生服務的書局。

對未來的期許

現今「學生書局」每月都有新書兩、三本問世，因此若連重印的舊書一起計算，每年也有五、六十本，目前圖書累計書種約1700種，共2700冊，一般書以文學、哲學類的書種最多，善本書則以史學書為主，這與當年創業時還需借書充門面的景況，早已不可同日而語。而回首成長歲月，由於學術出版積壓的資金十分龐大，書局也曾面臨幾次生存的挑戰，曾經嘗試往其他的出版領域發展，以求突破困境，但成效反而不是很理想，這多少是因為學術界對「學生書局」有著很高的期望，希望書局能多出些高水準的書，有了幾次的經驗，民國88年在現任總經理鮑邦瑞上任後，就正式確立「學生書局」未來走向純學術出版的路線，而為了容納一些較為實用導向或一般性的書籍，於民國89年特另成立了「學思出版社」，以區隔出版風格。

這些年來，除了書局本身的逐漸壯大，書局也開枝散葉轉投資了一些事業，像是與林海音女士合作出版的《純文學月刊》，與唐達聰、趙堡夫婦合作創刊《王子雜誌》，都曾有不少的成績。此外，更有一些書局的同仁，出外打拼，也獲致很好的發展，如至聯經出版公司出任總經理的劉國瑞、由印務起家，到自創「文史哲出版社」的彭正雄先生、創立「東昇文化事業公司」的顏高昇先生等、「樂學書局」的黃新新小姐等，大家都對國內的出版做出不少貢獻。

至於，「學生書局」未來的走向，鮑邦瑞以自己的觀察表示，臺灣學術界哲學的熱

潮，在牟宗三老師過世後，已經漸漸褪去，而自己覺得臺灣的經學向來沒有受到重視，但經學其實是一切學問的根本，應該加強，因此目前書局已經與林慶彰教授密切合作，未來期望將出版重點放在經學上，此外，在戲劇方面，也借重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楊振良教授的專長，召集兩岸這方面的學者一起合作，希望也能在戲劇領域的學術出版上有所貢獻。除了出版，目前來至書店門市的收入約可佔總營業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以專業學術書店的方式經營，除了賣自己的書也有賣別家出版的學術書籍，目前只有一家門市，未來並不會考慮擴大經營書店的部分，發展重心仍會是出版。

打開「學生書局」的歷史，彷彿看到了臺灣在過去的四十年間學術研究的發展脈絡，如果每個出版社存在的目的都只為賺錢，臺灣就沒有今日豐富的學術著作可以問世，「學生書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為臺灣四十年的學術發展留下了最直接的見證，回顧四十年的成長歲月，身為現任「學生書局」的總經理鮑邦瑞先生十分感恩的表示：「感謝學生書局歷任的董事長、總經理和所有曾經對書局貢獻心力的員工，更感謝學界許多教授、學者與讀者的支持，學生書局才能有今天的小小成就。未來只要臺灣的學術研究能繼續蓬勃發展，相信「學生書局」也將繼續以出版替臺灣的學術研究留下歷史的紀錄。」

參考書目

- 1.《書目季刊》，第13卷第4期，民69年3月，頁117-140。
- 2.學生書局編，《學生書局三十年》，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79年3月。
- 3.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1950-2000），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90年3月。
- 4.學生書局編，《學生書局書目一九九九年元月書目》，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88年1月。